

泽东亲自指示《解放日报》发表并在延安广播电台广播民盟这一宣言。

1945年3月1日,蒋介石声称要在1945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3月10日,民盟发表谈话,重申民盟对召开国民大会的态度,指出在国内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仍举八九年前所产生之旧代表,以之应付当前千难万难之新局面,则所谓民主云云,团结云云,岂不将徒托空谈?”民盟不赞成国大的旧代表,主张重新普选产生新代表,实际上是否定了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1945年7月7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召开,主要议题就是讨论召集国民大会问题。为了抵制国民党操纵这次大会,中共声明不参加此次会议。由于民盟与中共并肩战斗,终于使国民党参政员未敢倚仗多数席位强行通过按期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其后,针对国民党调集重兵突然进攻陕甘宁边区,民盟发表对时局宣言,严厉谴责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行

为,重申必须召集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改组政府,坚决反对国民政府于1945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

在抗战期间,民盟作为国共之外最大的一支政治力量,与中共密切合作,高举抗战、民主、团结的旗帜,坚决反对投降、专制、内战,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稳定团结抗战的大局,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针对国共尖锐对立、内战一触即发的形势,民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其后,民盟作为中共的亲密友党,为国共和谈、民主和平继续努力奔走,直至1947年10月被国民党强制解散,彻底丢掉幻想,公开宣布同中共携手合作,为建设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共同奋斗。

(作者系民盟中央研究室副主任)

“战后”70年日本的战争认识与战争记忆

□ 胡 澎

DOI:10.16632/j.cnki.cn11-1005/d.2015.09.006

2015年是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投降的第70个年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6年11月3日,明确写有放弃战争、不维持武力、不拥有宣战权的日本和平宪法颁布,日本从战争的废墟中再度崛起,走上了和平发展经济的道路。1982年4月13日,日本政府决定将8月15日定为“追悼战死者祈祷和平之日”。

此后,日本首相在这一天或发表追悼致辞,或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谈话,表达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与认知。

今年年初开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设立了专门委员会为起草“战后”70周年谈话做准备。“安倍谈话”是否会继承“村山谈话”(1995年)、“小泉谈话”(2005年)所使用的“侵略”、“殖民统治”、“反省”等表述,引发日本各界乃至其东亚邻国的强烈关注。8月14

日,“安倍谈话”发表,谈话没有直接明确地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没有对受害国人民直接表示反省和道歉,而是通过回顾以往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称“对于此前的那场大战,日本已经反复表示了深刻反省以及由衷的道歉之意,日本历代内阁的这一立场今后仍不会动摇”,“事变、侵略、战争等武力的威胁和运用,日本不会再次将其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来使用”。这种遮遮掩掩、闪烁其词的态度不能不令其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质疑日方的诚意,并对“战后”70年日本政府依然缺乏正确的战争认识感到遗憾。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围绕战争的历史认识、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中日之间依然存在着政治性和情感性的鸿沟。历史问题依然是中日两国无法回避的议题,也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巨大阻碍。

“战争受害者”意识

广岛的和平纪念公园里保留有原子弹爆炸中被毁坏的圆顶屋建筑,每年8月6日,日本各界都会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日本人在纪念广岛和长崎“原爆”时,受害者身份与受害者记忆淹没了对战争理性的思考。他们忘记了至关重要的一点——为什么日本会遭到核武器的轰炸,也很少去深究这场战争的缘起,更不用提对被侵略国家民众在战争中遭受苦难的换位思考了。

战时生活的窘困、亲人的殒歿、东京大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等,构成了日本人有关战争的记忆。这种强烈的战争受害意识也反映在日本“战后”的文学作品及影视作品中。“战后”出现了一大批极力表现和描绘战争给日本国民心灵带来严重创伤的作品。以

遭受原子弹轰炸为题材的作品甚至在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被称为“原爆文学”。影视界也诞生了大量反映战争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和痛苦的影视作品。这些影视作品不仅表达了战争当时带给日本民众的伤痛,还反映了“战后”数十年这一伤痛在日本民众的心灵深处依然存在,甚至出现了包裹着感人情节的为军国主义招魂的电影。值得深思的是,这些文艺作品在描写战争时有意识地回避了那些被侵略国家民众在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日本作为战争加害者的记忆被选择性地遗忘了,而仅仅保留了战争受害者体验和受害者记忆。随着20世纪9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以及民族保守主义思潮的主流化,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已习惯于将日本置于战争受害者的立场。

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的发动者和加害者被巧妙置换成了战争的受害者。在这样的逻辑下,成为受害者的日本难道还需要对战争进行深刻反省、忏悔和道歉吗?而对于在那场侵略战争中饱受苦痛与创伤的亚洲民众而言,尽管时光已经逝去了漫长的70年,战争受害者的记忆并未变得模糊。在中韩两国民众看来,要求日本正视历史、反省和道歉,要求对劳工和“慰安妇”予以道歉和赔偿,是再正常不过的要求了。而针对这一正当要求,日本有相当数量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民众心存反感和抵触。

为侵略历史翻案的逆流

“二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一股否认侵略战争罪行、美化军国主义战争,并为已经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甲级战犯扬幡招魂的逆流。甲级战犯被作为“忠魂”和“英灵”供奉于靖国神社,日本政治家堂而皇之地前往参拜。对强制劳工、“慰安妇”、日军遗留生化武器

等战争遗留问题，日本则否认、抹杀或故意缩小，尤其是右派政治家还不断公然抛出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的言论……

日本右翼政客和历史学者以及民族保守主义者利用新闻媒体、书刊，大肆宣扬“靖国史观”，宣扬“皇国昔日的荣光”，企图误导国民的战争认识。“靖国史观”主要有以下内容：隐瞒和歪曲历史事实，将战争爆发归咎于美英等国的“挑衅”和“压迫”，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塑造为民族自卫战；美化军国主义，将战争的目的美化为帮助亚洲摆脱白人殖民统治，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宣传为天皇尽忠效死的“武士道”精神；否定东京审判，为被处死的甲级战犯招魂。

这股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逆流还包括一系列实质性的行动。例如：1993年8月，自民党国会议员成立了“历史研究委员会”，1995年8月，该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否定日本对外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等予以全盘否定。1995年7月，藤冈信胜等教授、学者组织“自由史观研究会”，标榜站在纯自由的立场大胆重新认识历史，其目的也是为日本的侵略战争翻案。1996年12月，“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立，该组织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删除了“从军慰安妇”、“侵略”等记述和用语。2001年4月13日，日本文部省竟然宣布该教科书检定合格，从而引发了一批有良知的日本民众和中韩等国政府的强烈抗议。

缺乏对侵略战争的正确认知，对战争的记忆严重错位，这也就不难理解日本政要为何一次次参拜靖国神社，为何“战后”多次出现右翼教科书事件，为何日本政治家屡屡在历史问题上口出妄言，也就不难理解日本与中国、韩国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因历史问题而一次次跌入低谷。

“战后”日本的和平反战运动

“战后”的日本不乏有良知的学者、记者、教师、律师、普通民众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从人性的角度思考战争的性质，反思日本的战争责任，对战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那些亲身经历过战争、不断反思战争并愿意维护和平的人们结成各种团体，进行了维护和平、反对战争、防止战争重演的运动。

《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是第一个站出来全面采访、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日本记者，也是第一个将整个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告诉日本人民的学者。历史学家永三郎为了揭露历史真相，坚持在教科书中记载日本在“二战”中所犯罪行，与日本政府打了35年官司，其勇气及不屈不挠的精神令人钦佩。

日本的一些民间团体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反思日本的战争责任。他们编辑资料集、发行简报、举办演讲会、展示会等，还深入日军侵略过的国家采访战争的受害者、幸存者，亲身调查、搜集战争期间日本军队的罪行和证据，为构建日本民众对战争的客观、正确的记忆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慰安妇”问题上，日本一些市民组织特别是一些妇女团体对中国和韩国的“慰安妇”幸存者进行了大量的采访、调查和研究。2009年开始，“二战时期日军性暴力图片展”在山西省武乡县、北京、西安、广州等地举办。这主要是由日本一个市民团体推动的，他们致力于帮助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就对日要求谢罪和赔偿进行诉讼，同时将她们遭受的苦难和对日索赔的抗争向日本国内外广泛宣传。

针对右翼团体和民族保守主义者篡改历史教科书的风潮，日本一些民间组织进行了

卓有成效的斗争。在全国各地反对右翼教科书的市民、教师、学者、律师、劳动者、学生等团体的共同努力下,在韩国和中国民间团体的声援下,经过与右翼势力长达数月的较量,扶桑版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率远远低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确定的采用率10%的目标。目前,教育领域的进步市民团体正在发起新一轮抵制育鹏社版右翼历史教科书的运动。

近几年,日本的一些民间团体与中国、韩国的民间团体及学者合作,针对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共同编写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分别在中日韩三国出版发行。同时,中日韩三国的民间团体和学者共同举办的“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研讨会每年召开,显示了对战争历史有着清醒认识的东亚知识分子正通过相互交流、相互理解来探寻一条建构战争加害国与受害国共同历史记忆的道路。

今年7月16日,安倍政权处心积虑推动的日本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倚仗执政党在国会的议席数优势,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表决通过。这似乎表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大幅转变“战后”“专守防卫”国防政策的步伐难以阻挡。为此,爱好和平的日本民众发起了多场声势浩大的反对新安保法案的抗议游行。在“安倍谈话”发表之前,包括学者、教授、律师等在内的一批日本进步知识精英开展

了积极的行动,有74名国际法学、历史学及国际政治学的学者发表了联合声明,督促安倍正视日本的侵略历史。“安倍谈话”使用了“殖民统治”和“侵略”等措辞,与国际社会的压力以及国内和平反战运动的斗争不无关系。

“安倍谈话”中多处体现了本届日本政府极端错误的战争认识。“不能让和那场战争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们的子孙后代背负不断谢罪的宿命”道出了“安倍谈话”的用心。针对这句话,一位日本友人曾这样批判道:“谢罪,是承认自己的罪行并请求对方原谅的一种行为。对方如果说可以了,从原谅的那一刻,谢罪才能结束。作为侵略战争的加害国,受害国尚未认可你的谢罪,就说不再谢罪了,这让人无法原谅。”错误的战争认识与战争记忆只会让下一代日本人的历史观更加错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亚共同历史认识与历史记忆的建构任重道远。

超越历史的沉重负荷、实现和解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如何正视历史,认真反省,承担责任,并在此基础上得到被侵略国家的原谅,从而实现和解,是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关系到东亚能否走上和平、稳定与发展的道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社会室主任、研究员)

民族自卫战争的国际法意义

□ 刘 辉

DOI:10.16632/j.cnki.cn11-1005/d.2015.09.007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神圣自卫战争。巨大的民族牺牲换取了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彻底胜利,具有重大的国际法

意义。

首先,中华民族以英勇果敢的自卫行动改变了自身在条约体系内被摆布、被控制的被动